

西学东渐之初的“汤若望们”

明末至晚清时期，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通常被称为“西学东渐”。这个时期，传教士们乘着传播天主教的初衷来到中国，却因具备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而受到赏识和重用。其中，最跌宕起伏的一笔，莫过于汤若望与历法之争。

汤若望的“秘密武器”

1644年，清军入关。不久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监正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。古老大国的钦天监，一度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中心。

汤若望能获得清廷的重用，是因为他有一件“秘密武器”——1645年清廷开始颁行的《时宪历》。早在明末的1634年，《时宪历》的前身——《崇禎历书》已经编纂完毕，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，直到明朝灭亡，颁行新历的诏书也未下达。

汤若望是《崇禎历书》的主要编纂者之一。他之所以能凭借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历法，必须感谢他的前辈利玛窦。

利玛窦两次来到中国，他敏锐地注意到，这个古老的国家特别需要能编历书的人。他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，北京急需天文学家和天文学书籍，“皇上为了每年的编历，雇用了约200多人来做这项工作”。

利玛窦和明朝大臣徐光启合作，一度想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历书。这个想法最终经汤若望的努力成为现实。1634年，在中西学者合作下，历时5年的《崇禎历书》编纂完毕。

《崇禎历书》不是一本简单的日历，而是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的一部鸿篇巨制。长达137卷的历书中，甚至包含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说——哥白尼《天体运行论》的内容。

一场天文擂台赛

西洋新法真的准确吗？汤若望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呢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，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汤若望推测出，当年八月初一（9月1日）将有一场日食。

由于科学知识的局限，日食、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，素来被中国人视为不祥之兆。何况，这还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次日食。若能准确预测，肯定能令人信服。1644年7月29日，汤若望上书顺治皇帝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公开检验他的预测是否准确。

顺治不但满足了汤若望的请求，而且让钦天监支持大统历、回回历（阿拉伯传入的一种历法）的历学家，与汤若望同台竞技。

9月1日一大早，内城东南隅的观象台上，一场预测日食的天文擂台赛打响了。大学士冯铨带着望远镜，率领钦天监官员，与汤若望一同登上观象台。

汤若望成竹在胸，亲手将日食发生时刻及过程画在纸上。如他所料，日食分毫不差，准时发生。冯铨大为叹服，将测算结果记录下来汇报朝廷：“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，大统、回回二历俱差时刻。”

打赢了擂台赛，汤若望顺理成章成为新任监正，以五品朝廷命官的身份主持钦天监。

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，令顺治皇

帝相当满意。他对汤若望的依赖和信任，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。顺治称汤若望为“玛法”，这个词在满语中是对祖父辈的尊称。他下令，汤若望在觐见时可以免除叩头的礼节，满朝文武中，享受这种特权的大臣只有个位数。更有甚者，顺治在选择继承人时，也听取了这位“洋玛法”的忠告，选中了生过天花从而具备了免疫力的玄烨。

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，让汤若望成为清廷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1661年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向欧洲报告：“在帝国中，汤若望的影响要大于任何一位总督或最受尊敬的亲王。”

1661年，顺治去世的同一年，汤若望在北京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。然而，他完全没料到，一场“新旧历法之争”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
汤若望的牢狱之灾

最先发难的人是杨光先。他的名言“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，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”，让鲁迅先生都忍不住评述一二，“看起来，他的思想是活着的，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。”

杨光先的后台，是满族守旧势力的代表——辅政大臣鳌拜。

8岁的康熙皇帝继位后，大权渐渐落入四位辅政大臣手中。鳌拜一上台，就提出“率祖制，复旧章”，废除了多尔衮和顺治所定的各项开明政策，顺治的红人汤若望自然成为守旧势力打击的对象。

1664年，杨光先一口气罗列了汤若望等人的三大罪状：第一，潜谋造反；第二，邪说惑众；第三，历法荒谬。清廷经过调查，发现全都纯属子虚乌

有后，审理的重点只能转移到一个新的罪状——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。

荣亲王是顺治最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，出生三个月就早早夭折。爱母及子，顺治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，并建造了豪华的陵墓。入葬时，汤若望掌握的钦天监选择的时辰是辰时，礼部误用为午时。事情到了杨光先口中，变成汤若望故意选择不吉利的时辰，从而克死了董鄂妃与顺治帝。这相当于指控汤若望犯了弑君之罪，无论如何辩解，都不可能脱罪了。

1664年11月，汤若望、南怀仁等几名传教士被投入大牢。1665年4月中旬，南怀仁等三人被判流放，汤若望被判处死刑。

就在这时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4月16日，一场可怕的地震震撼了北京的大地。地震的余威尚未消散，4月29日，紫禁城突然失火，烧毁了大约40个房间。一时间，宫廷内外，人人惊恐不已，孝庄太皇太后大发怒火：“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，礼待极隆，尔等岂俱已忘却，而欲置之死耶？”迫于各方压力，鳌拜无可奈何地释放了汤若望。

逃过一劫的汤若望出狱后，被软禁了一年，1666年8月15日，他平静地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。

汤若望去世两年后才得以昭雪。杨光先等人被惩治，康熙下令今后有关历法之事，均由南怀仁全权负责。汤若望恢复官爵，并被隆重安葬在利玛窦墓地的旁边。他的坟墓比利玛窦的更为壮观，康熙亲笔为他撰写了祭文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杨丽娟/文

紫禁城里的人间烟火

在清朝，紫禁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、神圣的殿堂。然而，其中并不乏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清朝的早朝是康熙帝定下的制度，时间是每天6点钟，地点在乾清门前。为此，皇帝4点起床梳洗，大臣则半夜起床套车前往紫禁城，赶在4点进宫“待漏”，这样一来，早餐就成了一大难题，于是，宫中的“早市”应运而生，经营者是太监、苏拉（宫中杂役）。

每天清晨5点，隆宗门外一溜小吃摊子开始营业，烧饼、油炸果，佐以杏仁茶、炒肝、苏造肉等，搭配出售。尤其以苏造肉最为著名，据说肉酥汤鲜，若将烧饼泡入肉汤，其味尤美。由于食客是王公大臣，所以，经营者货真价实，不敢马虎，但价格昂贵，好在顾客不在乎贵贱，出手阔绰，以致生意兴隆。这道美味后来流入民间，几经“改良”之后，演变为雅俗皆爱的京味名吃——卤煮火烧。

溥仪回忆：“紫禁城中的早晨，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，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，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，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，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。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‘响城’。”皇帝深居宫中，烦心事不少，未尝不会羡慕民间的逍遥热闹，所以，紫禁城中的烟火气也为刻板的皇室生活增添了丝丝活力吧。

紫禁城中还有数不清的膳房，每天炊烟缭绕，颇富生活气息。大名鼎鼎的是皇帝的御膳房，分外膳房和大

内膳房。前者擅长烹调满汉全席，为皇帝大宴群臣一展身手，也做些烧饼油条，为值夜班的军机大臣提供“工作餐”。但皇帝大宴毕竟不多见，乾隆以后的皇帝都崇尚俭朴，力戒铺张浪费，时间一长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外膳房成了“烧饼铺”。大内膳房负责皇帝的一日两餐，下设荤局、素局、挂炉局（烧烤）、点心局、饭局等，每天二百多名厨役忙得不亦乐乎。

清朝皇帝的御膳以鲁菜为主，辅以淮扬菜和关外满族菜品，风格杂糅。在制作时，每一品菜的主料、辅料配比都有严格规定，一丝不苟，不许创新。御膳品种繁多，制作完成耗时很长，御膳房只能提前一天做好，然后放在炉子上保温，以确保皇帝一声令下，按时传膳，但这样一来饭菜的口味大打折扣。溥仪撰写长篇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时，仍抱怨御膳难吃。他还透露了一个“秘密”——从光绪起，皇帝就不吃御膳房的饭菜了。

皇帝不吃御膳房的伙食，那他吃什么呢？原来，光绪4岁被慈安、慈禧两宫皇太后抱养进宫，登基为帝，他吃的是太后的御膳。按清宫惯例，如果太后健在，也要开办专门的膳房。比如慈禧太后就拥有三个膳房。光绪帝年幼进宫，跟着慈禧吃小灶，皇帝御膳成了摆设。溥仪也不吃御膳房的饭菜，他回忆：“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……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，不过做个样子而已。”

据《同舟共进》喻大华/文

